

建安诗歌繁兴而蜀吴诗歌凋敝原因探析*

傅正义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7)

[摘要] 三国时期,魏诗一花独放,掀起了文人诗的第一个高潮,并以“建安风骨”、“汉魏风骨”享誉诗史,而蜀、吴则“吟咏靡闻”,一片凋敝。学界对此有所关注,但大多点到即止或附带言及。从文化传承、领导学养、用人标准及教育状况四方面探析并揭示蜀、吴文人诗落后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 建安诗歌;繁兴;蜀吴诗歌;凋敝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98(2008)04-0105-05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从而形成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掀起五言古诗的黄金时代。他们“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师心以遣论”、“使气以命诗”(《文心雕龙·才略》),赢得“建安风骨”、“汉魏风骨”之美誉,对“盛唐气象”的形成,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史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而同时期的西蜀、东吴诗坛,却冷冷清清,一片凋敝。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曹魏作家30人诗380首,收杂歌谣辞、郊庙歌辞、魏鼓吹曲辞60首,总计440首;收东吴作家8人8首诗,收乐府古辞、杂歌谣辞、吴鼓吹曲辞28首,总计36首;收西蜀作家1人1首诗,收杂歌谣辞9首,总计10首。从诗人数来看,魏是吴的三倍多,是蜀的30倍;从诗歌数来看,魏是吴的10多倍,是蜀的40多倍。所以钱志熙的《魏晋诗歌艺术原论》说“诗歌艺术主要是在魏文化中发生的,吴、蜀两处则近于‘吟咏靡闻’。”^[1]魏、蜀、吴诗坛,同时共生,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反差?本文仅就文人诗歌创作,从文化传承、领导学养、用人标准及教育状况四个方面作一比较性探析。

一、文化传承

文学是文化的一种艺术表征。文学的兴衰,其

根源在文化的兴衰。魏、蜀、吴三国诗歌虽同时共生,但其文化背景却有着极大的差异。

中国先秦文化,可大致分为北方以儒为主的文化 and 南方以道为主的文化。先秦儒家讲仁讲义,强调人的社会性、共性,也重视“为仁由己”、“匹夫不可夺志”的独立人格和个性发展,由此儒学也提倡“文质彬彬”、“尽善尽美”、“学于诗”、“游于艺”,重视“文”,品评“诗”,欣赏“美”,甚至达到“三月不知肉味”的痴迷境界,《论语》中大量语句,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也极具诗性精神,具有诗人气质。先秦道家文化“法天贵真”,主张“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反功利,重个体,提倡个性自由、思想解放,从本质上讲,更富有艺术精神和诗性品格。先秦北方文化孕育了《诗经》,南方文化滋养了《楚辞》。到了汉代,“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诗人之风,顿已缺丧”(钟嵘《诗品·总论》),诗性精神失落了。汉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一尊的文化专制,扼杀了儒、道子学自由的、创造的、审美的艺术原质。汉人尊《诗》为经,变《骚》为赋,将《诗经》活生生的、抒情言志的艺术创造变成经学政治的僵死教条,把“长于幽怨之辞”的《楚辞》变为体物叙事、润色鸿业的散体大赋。东汉中期以后,王纲解纽,道术分裂,经学衰微,子学复起,“匹夫不可夺志”的士子人格得以恢复,知识分子出现群体自觉,有了相对独立的思想、立场和理想精神,与经生的从政依附、

* [收稿日期] 2008-03-10

[作者简介] 傅正义,男,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汨落性灵和赋家的“见视如倡”、“劝百讽一”大不一样,他们敢于“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后汉书》卷67)王充、王符、崔寔等思想家在古文经学的基础上,吸收了老庄自然天道、自由人格的思想,反对今文经学的讖纬迷信,解放思想,破除偶像,勇于批判,重视创造,一定程度上恢复发扬了先秦子学越世高淡,不复依傍的独立、创造精神,从而也使“诗言志”的诗性精神得以突破枷锁,获得新生。同时东汉以降,古文经学逐渐取代今文经学,今文经学“纯以天道说诗”(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卷六),用神学政治学的眼光说诗,而古文经学重视文字训诂,提倡实事求是,虽然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义”,仍不脱社会政治学的樊篱,但毕竟一定程度上承认“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以渫愤懣,舒泻愁思”(《楚辞章句·天问序》)的诗歌抒情言志的艺术特征。汉代末年,灵帝好文艺,置鸿都门学,一反太学的以经学相招,却以文赋、尺牍及工书鸟篆相招,并且“鸿都门士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后汉书·蔡邕传》)鸿都门学客观上加速了经学的衰微和文学才艺的复兴,所以刘师培先生《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谓“汉之灵帝,颇好俳词,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将灵帝时的文风变化视为汉魏文学变革之一“迁蜕之由”^[21]。曹操习染于汉末文化变革风气之中,作为名士身份,曹操继承发扬了东汉后期党锢人士的政治主张和子学精神,儒法兼取,礼刑并用,求实务本,思想通脱;作为宦官出身,他也自然而然地受到鸿都门学的影响,善书法,通音律,好诗赋,多才艺。曹操建立起以士人为主体的政治体制,彻底结束了东汉以来的外戚、宦官专权,结束了有汉经学的长期统治,迎来了魏晋的思想文化的大解放,从而为建安诗性精神的大解放、大发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政治保障和文化艺术土壤。

然而这一切文化变革主要发生在京洛一带,发生在曹魏政权所在地,而西蜀、东吴则因避处偏远,影响甚微,基本上还是“死水微澜”。其时蜀地本土学者,如张裔、杜微、周群、周巨、杜琼、何彦英、譙周等大多仍因循东汉前期学风,多今文经师,重讖纬之学,这正如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凡例》所说:“三国之际,经学已成弩末。况值马、郑之后,多变今从古。然此风于曹魏尤甚,若蜀、吴地僻,今学尚未尽漓,故虞氏之《易》出于孟、杨,仲通之《书》犹

本于欧、夏,余亦多出今文。相比京洛的古文取代今文及子学兴起、经学衰微,蜀汉本土文化出现了一个极大的时间差,仍因循守旧,处于保守落后的文化惯性之中。如此文化与士风,不可能产生诗性精神,催开艺术之花。流亡蜀汉的士人分为两类,一为刘焉父子时入蜀士人,如许慈、胡潜、来敏、许靖等人,多习古文,且成就较高,但不得刘备重用;一为随刘备入蜀的荆州士人,也习古文,虽得其用,但素质不高,人数也少。他们都缺乏东汉以来发生在京洛一带的思想解放思潮的洗礼。更何况刘备、诸葛亮为代表的蜀汉政权,主要是一个政治、军事政权,又以“匡复汉室”为治国方针,缺乏文化变革的考量和批判、创新的举措。

东吴与西蜀相仿佛,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东吴本土学人,如阚泽、唐固、虞翻、陆绩等多治今文经学,讲求天人感应和象数占验;侨居士人如士燮、马普、张昭、张紘、诸葛瑾、薛综等多习古文经学。不过,前者于孙吴后期受荆州及中原学风影响,多习古文《毛诗》,并援道入儒,以《老》、《庄》解《易》,这对吴地诗歌远逊于魏,但稍胜于蜀,且入晋后,吴地诗人成就斐然,当有一定影响;后者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高于蜀汉,学风也相对开放一些。

二、领导学养

领导者的学养,对文化、文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曹操“御军三十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徐公持先生《魏晋文学史》称曹操“古文经学修养深厚”^[31]《魏志》本传也谓曹操“年二十,举孝廉”、“以能明古学,复征拜为议郎”。曹操并不墨守古文经学,而是从子学精神和实用理性出发,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魏志》本传),儒、法、道兼取,礼、刑、兵并用,并且唯才是举,勿拘品行,从政治和思想层面,结束了东汉以来的外戚、宦官专权,建立起以士人为主体的政治体制,结束了两汉经学的统治,迎来中国思想史上,继春秋战国诸子互起、百家争鸣之后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谓“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41]高度评价了曹操在政治、思想上的开拓及其对建安文学的开创性影响。

在诗歌创作上,曹操“雅爱诗章”(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

皆成乐章。”(《魏志》本传注引《魏书》)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乐府诗的诗人,第一位大量抒写五言诗的诗人,并且“自汉以下,文章之富,无出魏武者。”(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二)成为建安诗坛的领袖和“建安风骨”的开创者。曹操还是一位文论家,虽其文论不存,但从《文心雕龙》所记片断来看,曹操所论涉及诗、文、赋,对建安文风的建立,也当有相当的指导意义。

曹丕“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典论·自叙》)与曹操一样博涉多通,务本尚用,思想解放,行为通脱,所不同的是,少了一些曹操的王霸之气和刑名之术,多了一些黄老的无为政治、通达作风和文士气质。他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文学专论,也是文学突破经学的束缚而觉醒、独立的标志。在诗歌创作上,曹丕与邺下文人“行则连舆,止则接席”、“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曹丕《又与吴质书》),掀起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加速了乐府民歌的文人化进程。

蜀国统治者刘备,“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年十五,母使行学,与同宗刘德然、辽西公孙瓒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卢植。”(《蜀志·先主传》)卢植为汉末古文经师,刘备虽“不甚乐读书”,学养不深,但也多少受到儒学习染。《蜀志》本传注引《诸葛亮集》载刘备遗诏敕后主曰:“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甚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从刘备临终为刘禅所开书目看,刘备还偏重刑名法术,所以徐公持先生《魏晋文学史》谓“刘备对文化,注重的是治政鉴戒及战争韬略”^[5]。对非功利的文学,刘备毫无兴趣,也无诗赋之作。

刘备之后,蜀汉实际领导者是诸葛亮。诸葛亮曾游学荆州,受荆州古文经学影响,但仅“观其大略”(《蜀志》本传注引《魏略》),并不墨守章句。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更重视《申》《韩》《管子》《六韬》等军国实用之书,从政后,“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匹亚矣。”(《蜀志》本传)诸葛亮主要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其学务实尚用,博采众长,兼收儒、法、兵、阴阳家、纵横家,虽有文学才华,但长期治戎讲武,奖励耕战,死

而后已,不遗余力,对文学事业少有关心,所作散文皆表、章、书、论等实用文体,相传诸葛亮有《梁父吟》诗一首,学界多认为不实。蜀汉文学不兴,诗歌凋敝,当与刘备、诸葛亮的学养直接相关。

东吴孙坚少小家贫,以种瓜为业。17岁刀劈钱塘“海贼”而“显闻”,后凭其“勇挚刚毅”而“孤微发迹”(《吴志》本传)。其子孙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吴志》本传),然而“学问不博”(《吴志·虞翻传》注引《江表传》)、“无文学之才”(《吴志》本传注引《吴录》),与其父孙坚一样,皆披坚持锐、骁勇善战而已。孙权谓吕蒙“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并劝吕蒙“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吴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但从孙权少年任事,十几岁便随兄孙策征战,一生也无文化建树,无文章传世,且曹丕曾嘲笑孙权“知学乎”(《吴志·吴主传》注引《吴书》)来看,孙权“文化上并无太深修养”、“文学根底相对浅薄,与曹氏父子差距远甚”^[6],所重也不过兵书、史鉴一类实用学问罢了。东吴领导者如此学养,文学事业、诗歌创作便很难进入他们的视野。

三、用人标准

用人标准,相当程度上规定着人才的规格。

曹操不用经生,不拘品行,务本尚用,唯才是举,“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求贤令》)《举贤勿拘品行令》更是标举“负汗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曹操的用人政策,结束了汉廷的以经取士,带来了士人思想的大解放,文学创作也不必再附骥六经,止乎礼义,从而突破经学的束缚而自由独立。曹操还特别起用文学之士,正如曹植《与杨德祖书》所说:“昔仲宣独步于江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北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蔡琰流落匈奴,曹操命专人持金碧赎归。曹操几乎网落了当时所有文学英才,“盖将百计”(钟嵘《诗品·总论》),并且“登高必赋”,身体力行,为邺下文人集团作出了表率。这些文士,大

多身兼军政职务,有的还居于要职,如王粲为侍中,阮瑀、陈琳、刘楨为司空军谋祭酒。

曹丕《取士勿限年诏》曰:“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主张取士不限老幼,不拘一格,重在实用。曹丕作为邺下文人集团的核心人物,与他们“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籍谈笑”(《文心雕龙·时序》),吟诗作赋,促成了一代诗歌的繁荣。

刘焉、刘璋父子据蜀期间,施行经学政治,重经术,轻文学。刘备入蜀,以汉代宗室自诩,以“匡复汉室”为大计,典章制度承袭汉朝,用人政策也秉承汉法,颇重儒士经师。虽也重治乱“俊杰”之士,但仍以儒家“忠义”、“贤德”为本,相对曹魏政权“唯才是举”,则明显保守。刘备不重文学之士,遂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存蜀地文人诗仅一首,乃费祎所作;费祎博学多才,出使东吴,孙权誉之为“必当股肱蜀朝”(《蜀志·费祎传》),然被刘备闲置,未得大用,“先主立太子,祎与允俱为舍人,迁庶子。后主践位,为黄门侍郎。”(同上)费祎在刘备朝,仅为陪伴太子的闲官。又如秦宓,陈寿评曰“文藻壮美,可谓一时之才士”,也仅任从事祭酒一职,刘备将征东吴,秦宓“陈天时必无其利”,竟被刘备“下狱幽闭”(《蜀志·秦宓传》)。

诸葛亮用人标准与刘备差不多,只是更强调一个“忠”字,诸葛亮称赞郭攸之、董允、费祎“志虑忠纯”(《出师表》),称赞蒋琬“托志忠雅”(《蜀志·蒋琬传》),赞赏姜维“忠勤时事”(《蜀志·姜维传》)、董和“有忠于国”(《蜀志·董和传》)、陈震“忠纯之性”(《蜀志·陈震传》)、王平“忠勇严整”(《蜀志·王平传》)、杨洪“忠清款亮”(《蜀志·杨洪传》)。诸葛亮也不重文学之士,陈寿评曰“文辞灿烂”的郤正,长期屈沉下僚,“官不过六百石”(《蜀志·郤正传》)。况且诸葛亮“事必躬亲”,也限制了人才的使用和发展,以至出现“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局面。

孙坚“身当一面”、“所向无敌”(《吴志》本传),孙策“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皆重武将,不重文士,孙策也自谓“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权)”(《吴志·本传》)。孙权“招延俊秀,聘求名士”,“待张昭以师傅之礼,而周瑜、程普、吕范等为将率。既重武将,又重文臣。孙权“任才尚计”(《吴志·吴主传》),用人特重谋略,孙权赞周瑜“胆略兼人”,赞鲁肃“决计策意,出张、苏远矣”,赞吕蒙“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

瑾”(《吴志》第九),赞陆逊“天资聪睿”,“怀文武之才”(《吴志·陆逊传》)。孙权也用文学之士,虽远不及曹操父子,但胜于刘备、诸葛亮,如张紘“著诗赋铭诔十余篇”,深得孙权敬重,“以为长史”(《吴志·本传》),薛综“著诗赋难论数万言”,孙权征为五官中郎将、太子少傅,韦昭今存《吴鼓吹曲》十二首,为东吴最有文才者,孙权征为丞相掾、太子中庶子。东吴文学稍胜于蜀汉,且入晋后,东吴文人强于蜀汉,恐怕也与此有关。

四、教育状况

教育是文学的基础。

曹操“外定武功,内修文学”,于建安八年(203年)颁布了《修学令》:“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者而教学之。曹丕称帝,于黄初元年恢复太学,“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魏志·王朗传》注引《魏略》)其时太学思想解放,学术多元,“诸博士率皆粗疏,……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求浮虚者各竞逐也。”(同上)不守经学章句,故曰“粗疏”;不尚经学义理,故曰“不念统其大义”;重视才艺之学,故曰“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至于“浮虚者”,自鸿都门学以来,一定程度上成为才艺之士的特指。如此教育,无疑有利于文学艺术的滋生繁衍。曹魏时学官还发生过激烈的学术论争,著名学者王肃,其学“列于学官”,“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时乐安孙叔然,受郑玄之门,人称东州大儒,……叔然驳而释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诸法,又著书十余篇”(《魏志·王肃传》)这也表明曹魏学官的学术空气自由活跃,学术思想开放多元。

蜀汉也比较重视教育,刘蜀入蜀,便设太学,立博士,郡县也立学传教。据载,尹默、来敏、周群、谯周等皆为学官,特别是周群、谯周皆蜀中大儒,主今文经学。“先主定蜀,署(周群)儒林较尉。”(《蜀志·周群传》)“丞相亮领益州牧,命(谯)周为劝学从事。……大将军蒋琬领刺史,徙为典学从事,总州之学者。”(《蜀志·谯周传》)今文经学烦琐芜杂,荒诞迷信,与东汉中原盛行的古文经学重文字训诂,主实事求是,已显得保守落后,与曹魏的经学衰微、思想解放更不可同日而语,如此教育,当然就

难以突破经学的桎梏,由“人的自觉”走向“文的自觉”。

孙策、孙权立国江东,长期未设太学及博士学官,直到黄龙二年(230年)孙权方“诏立都讲祭酒,以教诸子”(《吴志·吴王传》),以徽崇、阚泽、薛综等名儒为太傅或少傅,传授经史,东吴始有国学之教。但孙权所立,仅教诸子,限于宫廷,并非面向社会。孙休继位,于永安元年(258年)下诏兴学,但已朝政日非,未能具体实施。总之,孙吴统治者不重学校教育,缺乏对文化、教育事业的考量和作为。东吴士族家学、民间私学于史有征,但也规模有限,学风未盛。

综上所述,从文化传承上看,曹魏与时俱进,文化先进,蜀、吴则固步因循,保守落后;从领导学养上看,曹魏博学多才,雅爱诗章,蜀、吴则学问不博,

无文学之才;从用人标准上看,曹魏唯才是举,重文学之士,蜀、吴则重忠义权谋,不重文学之士;从教育状况上看,曹魏重教,且学术多元,自由开放,蜀则复汉学,重经术,吴则不重教育,仅家学、私学而已。由此,魏诗一花独放,蜀、吴则一片冷落,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参考文献]

- [1] 钱志熙. 魏晋诗歌艺术原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81.
- [2] [4] 刘师培.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7.
- [3] [5][6] 徐公持. 魏晋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27, 222, 220

(责任编辑:杨 睿)

Analysis on Thriving of Jian'an Poetry and Withering of That of Kingdoms Shu and Wu

FU Zheng - yi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chool,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Abstract: The age of Three Kingdoms witnesses the blooming of poetry in Kingdom Wei, which sets off the first surge of poems in the history of poetry and brings it the prestige of "Jian'an Essence" or "Han - Wei Style", while the bleak garden of poetry in Kingdoms Shu and Wu bears a poor harvest of poems. The phenomenon concerns the academic circle, yet up to now few, if any, papers have made a monographic study of it, though the topic is touched or mentioned by many. This paper makes a related analysis in terms of culture transmission, leader qualification, delegating criteria and educational status quo, trying to reveal the roots that keep the poetry of Kingdoms Shu and Wu lagging behind.

Keywords: Jian'an Poetry; thriving; poetry of Kingdoms Shu and Wu; withering